

回應：「後帝國」中國的歷史實驗、矛盾與延續

Response: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 of Post-Imperial China and Its Contradiction and Continuation

劉紹華*

Shao-hua LIU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一書，也許真如我所願地，寫到了當代中國歷史的某根骨子裡。因為，本期幾位中國年輕學者也把此書讀到骨子裡了。身為作者，對此我十分感激、且有所感悟理解。

我看過一些關於此書的評論或讀後心得，通常有種直接感受，不盡然但大致可以作者的研究領域區分。也就是說，對於不熟悉中國政治與歷史的人，在閱讀此書時，會看到一個麻風防疫的故事，也會看到中國的歷史及其問題，也可能理解我所提的公衛防疫與社會代價的糾結，亦可能以此書案例而提出比較研究的問題，各種學術關注或批評都可能出現。但是，對於我在書中所提的一些概念、我為何以麻風醫生而非病人為書寫主軸、或者麻風對於理解中國治理的意涵，卻不見得一定有深刻的脈絡理解與感受。

相較之下，對於許多中國學者而言，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學者與學子，此書應該是打中了他們理解中國的某處關節要點，是以他們的讀後感、評論或探問著實殷切深刻。因為他們關注的不只是知識或學術，更是能如何理解、超越、再回望他們的身處之地與自身角色。

對於一般的學術討論或批評，我一貫地認為學術乃公器，著作接受各方公評是義務，研究者宜抱持感謝指教與反思便是的態度。然而，我深切關注人

投稿日期：2020年6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09月14日。

*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聯絡方式：shaohua@sinica.edu.tw。

airiti

的處境，更對研究之地的人們負有多重倫理責任，中國年輕學者又將此書讀得如此深刻，我以為那已非一般學術評論的深度。因此，我想至少應該在倫理與情緒理解的層次上有所回應，以提升吾輩歷史中人共體時艱的對話誠意。

一位中國學者曾經對我說，他在閱讀此書時產生了非常平靜的感覺。明明就是一本悲苦、動盪的歷史敘事，為何會令人產生平靜的感覺？這很奇怪嗎？

對我而言，他的反應並不奇怪。因為，我在書寫這段動盪且悲慘的歷史時，也有同樣的感覺。我的心之所以平靜，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我把一段原本被壓抑消音的歷史、甚至如果我不研究撰寫未來仍可能持續被遺忘在歷史底層的紀錄，盡量地讓它得見天日。以當代中國而言，要能平心靜氣地揭開埋藏的公共性歷史，並不容易。哪怕只是企圖這樣做，本身就是一種寧靜雋永的召喚和安慰了。

在中國，對真切人道主義的追尋是未曾停歇的現代性批判與探問，而記錄是為一種方法。我致力於挖掘再現的麻風防疫歷史，也許就如書評作者張超雄所言，「這種可見性，使得人作為『人』而被看見，在我看來，是貫穿本書的一種人道主義」。其實，無論身處何地，做為一位經常處於田野見證之中、且向來關注邊緣與不平等的研究者，這種對於人道精神的提問與追求是我的生涯日常。

因此，當書評作者張超雄指出此書注入了我個人的情緒勞動，我感到一針見血。此書選擇使用「情緒勞動」這個概念來描述麻風醫生，正是因為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我切身體會看見、理解、挖掘、分析、重建、詮釋與書寫這一段歷史之艱難。雖然，我面臨的挑戰絕對遠不及麻風醫生的處境，但在政治與人權的情緒抑制和應對上確有堪比之處，此書實然是在見證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時，所付出的相當情緒勞動。我可以不汗顏地說，這個研究我「扛」了十多年。這一段漫長的情緒勞動，遠超過一般學術研究之要求，如果不是內在的研究倫理堅持與歷史正義價值的驅策，我應無可能、也不需要完成這個我至今仍然覺得很困難的研究。

這幾位中國年輕學者亦藉喻麻風歷史，理解2020年初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反向思考，無論如何，歷史的重複都突顯了此書所描寫與

分析的中國。如同我在書中第一章便指出：

歷史以疾病和隱喻的方式一再重演，與人群及地理政治始終糾纏。（劉紹華2018: 58）

「後帝國」的實驗、矛盾及延續

本書的副標題是「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如果只看書名而未閱讀導論的讀者，有可能會往不同方向去理解「後帝國」的意思，以為那僅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時序指稱。其實不然，「後帝國」一詞在此書的意涵，不強調以「時期」定義，更是一種政治精神狀態的隱喻和目標，因此我才以「實驗」或「論述」稱之。

如同書評作者張超雄指出：「麻風在中國的基本消除，雖然經常被大眾認為是集體化時期群眾運動的成果之一，實際則是一個更加複雜和長時段的結果。作者用『後帝國實驗』這一概念去強調一種時間上的脈絡連繫，以及國家意識形態和實踐上的矛盾」。另一位書評作者董顯亮對於「後帝國」實驗則有如此的理解與詮釋：

「後」不僅僅標識了時間線索，更代表了作者試圖揭示共和國論述中的矛盾，並將其拆解的歷史書寫態度，而這些矛盾在過去常被掩蓋在社會主義制度與意識形態話語之下。「後帝國」的另一核心則涉及「帝國」的陰影及其顯形，在以麻風防疫為中心的「後帝國實驗」下，歷史論述的矛盾愈發明顯，它體現在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中國並未如自我標榜的那樣，與「帝國」和「殖民」決然分裂；反而是在承襲了教會與帝國醫療的建制與師資之後，繼而在蘇聯、全球模式的更迭中，「新帝國」不斷塑造著自己的話語。[…]中國式集體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話語愈是想將其遮蓋，它身上的帝國病徵卻越是引人注目。（董顯亮2020: 277）

他們的詮釋符合我的論述用意，如同我在導論中所寫道的：

我以「後帝國」來定位本書的時代性，主要涵蓋一九四九至七六年間的中國。這段期間一般泛稱為毛澤東時代，但此一表述通常指涉政治極權與一九五八年正式開始的集體化公社制，卻無法彰顯本書強調的重點，包括：此期中國集體對於歷史、西方教會、醫學知識系譜、發展典範的論述與實作方向，以及眾人對此論述的擁護、配合與矛盾情緒。[…]中國的後帝國掙扎，未曾走出內化深刻的帝國架構。（劉紹華2018: 58）

總而言之，「後帝國」的論述或實驗目標、矛盾與代價，是理解這一段歷史的重點，甚至對於理解當前的時代，其意涵應該也有所適用。是以，我在本書內文之末又寫下類似話語，以定位我對麻風隱喻的變與不變：「歷史以跨越時空和固著隱喻的方式，一再重複。」（ibid.: 453）

只是，我也沒料到，這個結論的現實感再度來臨得如此之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武漢封城後六日，我寫了一篇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不同的媒體轉載時替該文下了不同的標題，無論如何，大致上都提到文中指出的中國「面子治理」問題。以下摘錄部分內容：

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煙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劉紹華2020）

不論是在研究《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或書寫上述文章時，我都感到沉重，歷史重複與消音常態一再上演，這種撲面而來的歷史現實感，於我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研究經歷，更何況身處疫情之下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閱讀此書或其他相關研究時的親歷體悟，該有多麼地具體而微且冷冽？從本期書評作者孫賀的感想可見一斑：

當麻風醫生們「汙名」下的生命史，在巨變中國的歷史脈絡下被書寫。原以為這一切已然成為過往，行將被掃入歷史的塵埃中，但此次令人頗感意外的新冠疫情，卻將他們生命史中可捕捉到的命運蹤影，又以一種重力加速度般的展演形式，高度濃縮式地再現於整個防疫過程中。（孫賀2020: 272）

在新冠病毒的影響下，《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又常被找出來討論，書評中也可看見作者對現實疫情政治的關注與憂心。原本不少人以為此書只與麻風病有關，僅聽聞過卻未曾想要閱讀，這時卻發現，此書其實攸關中國重大疫病治理的認識，關於麻風，卻也超越麻風。正如我在文章中的感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是甚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劉紹華2020）。中國麻風的防疫故事不只對認識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疫病有意義，對世界認識中國、甚至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國，亦有其意義。容我繼續引用書中所言以為說明：

在後帝國實驗下，中國民眾付出的代價，以及知識分子夾處反帝愛國與國家施加的屈辱之間，是難以言喻的時代特色。[…] 本書所記錄的那些數十年來遍布中國各地的防疫生涯，共同構成了麻風醫生在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集體情緒勞動。這些珍貴故事敘述了由國家強迫的勞動及與之而來的複雜情緒，有助於我們看見本書的三個分析面向：政治論述與實作的矛盾、醫療訓練的傳承與困惑、汙名與科學主義的迷思，藉此透視那一場成功防疫的後臺。（劉紹華2018: 32-33）

結語

究竟，該如何評斷一個國家的防疫是否成功？除了表面上可見的疫情數字與國際比較，研究者更須回到各國具體的政治和防疫實作，才能真正探究「成功」或「不成功」。換言之，比較研究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具體清晰的案例之上，而非單信官方報告或表面數字，更不宜僅以理論或經驗臆測。

以此書而言，所謂的具體清晰案例，就是我必須詳細建構這個案例的脈絡、特性與過程；而我以為，此案例的脈絡與特性，必須放在巨變中國的時代轉型與政治心態，才能彰顯微觀之意涵與價值。不僅研究歷史時需

要理解此宏觀脈絡，欲理解當前也一樣需要宏觀視野，才能透過微觀與具體的資料「揭示隱而不宣的複雜社會邏輯，以突顯影響特定社群中人的行為、思想及語言等道德規範的文化特質 (ethos)」(劉紹華 2013: 36)。

感謝《文化研究》與書評作者，無論此書獲得的評論為何，其所書寫的公共性疫病歷史能被慎重對待和閱讀，已令我十分感激，這是對我的研究倫理、學術使命與社會關懷的重要鼓勵。僅以此文聊表致意與理解吾輩歷史中人叩問現實之殷切。

引用書目

- 劉紹華 (Liu, Shao-hua)。2013。〈中國麻風病治理的科學主義與政治儀式〉“Zhongguo mafengbing zhili de kexuezhuyi yu zhengzhiyishi” [Chinese Scientism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Leprosy Control]，〈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1): 35-64。
- 。2018。《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Mafeng yisheng yu jubian zhongguo: houdiguo shixian xia de jibing yinyu yu fangyi lishi*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s: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臺北 (Taipei)：衛城 (Acropolis)。
- 。2020/01/29。〈劉紹華：說給倖存者聽——「面子」治理下中國反覆付出的防疫代價〉“Shuo gei xingcunzhe ting: ‘mianzi’ zhili xia zhongguo fanfu fuchu de fangyi daijia” [Speaks to the survivors: the repeated costs under the “Mianzi” governmentality of China]。《端傳媒》 *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29-opinion-shaohua-ncov/> on July 5, 2020.
- 孫賀 (He SUN)。2020。〈「麻風為業」的當代中國式汙名與韌性〉“‘mafeng weiye’ de dangdai zhongguoshi wuming yu renxing” [Careering Along with Leprosy: Chinese Leprosy Doctors’ Stigma and Their Resilience]，〈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31: 272。
- 董顯亮 (Xian-Liang DONG)。2020。〈要呼吸？還是面子？在新冠肺炎的時代重讀麻風〉。“yao huxi? haishi mianzi? zai xinguan feiyan de shidai chongdu mafeng” [To Breathe? Or to Save Mianzi/Face?: Rereading Leprosy in the Covid-19 Era]，〈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31: 277。